

旅游产业发展与底层流动机会

——以湖南湘西凤凰县为例

孙贝贝

摘要:近年来,学术界高度关注社会阶层结构固化与底层群体社会流动受限问题,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状况,被认为是导致这种固化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社会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对开辟更大的社会流动空间和流动机会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机制,在经济相对欠发达但正在起飞发展的地区可能尤其如此。以湖南凤凰县为典型个案,探究贫困地区新兴旅游产业的发展对底层群体获得向上流动机会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兴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服务业的扩张,为贫困地区底层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改善了底层群体在就业和职业结构中的分布,拓宽了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渠道,增加了短距离社会流动机会甚至长距离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关键词:底层群体 旅游产业 社会流动

西部贫困地区是我国旅游资源富集区。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发展旅游业成为西部贫困地区实施经济追赶和脱贫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旅游业逐步变成综合优势产业。为游客提供相关服务的旅游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多个行业和部门,对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and 乘数效应,是西部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具有连带的相关性,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而职业又是观察社会流动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综合指标。本文尝试以湖南湘西凤凰县为典型案例,探讨旅游产业发展对西部贫困地区底层群体社会流动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葛兰西(A. Gramsci)曾经用“底层”(subaltern)一词指称欧洲社会那些处于从属地位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转引自王洪伟,2010)。此后,学术界对“底层”概念及其社会意涵进行了丰富多样的讨论。尽管对究竟什么是社会底层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大体确定了底层群体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比如经济收入较低、生活贫困、受教育水平不高、就业不稳定、社会资源占有比较匮乏等,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端。在中国,研究者更多的是在社会转型视角下讨论社会底层群体,强调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机会而带来的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曾以职业为纵轴,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社会阶层,认为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占有很少的组织、经济、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课题组认为,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方向是尽量减少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壮大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并以此为基础扩大社会中间阶层,实现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化(陆学艺,2002)。由此看来,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方向,并不仅仅限于社会成员从社会底层跨越多个阶层的长距离社会流动,促进相邻阶层地位之间的短距离流动也是重要途径。当然,不同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例如孙立平(2003)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日益向上层积聚,导致底层社会

形成,底层群体与其他阶层群体之间缺乏有效整合机制,城乡之间出现断裂,底层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近年来,中国社会确实正在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底层群体,底层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不断变窄。从已有研究来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机制一方面向人们提供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促使优势阶层与底层群体的社会距离拉大,阶层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增强,底层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阻力增加,长距离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明显减少(李春玲,2005:403)。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其他制度政策阻碍农民向上社会流动,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城市底层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尽管教育是影响底层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然而,国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弱化了教育促进底层群体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余秀兰,2014)。因此,近年来,不少研究文献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或已经形成社会阶层再生产的趋势和结构逐渐固化的格局,一些文献认为这个固化格局是进入21世纪后开始形成的,有的研究甚至把2005年视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原本相对开放转向相对固化的时间拐点(郑辉、李路路,2009;杨菁慧,2012;钱民辉、陈旭峰,2014;边燕杰、卢强,2014;宋林霖,2016)。

但我们注意到,现阶段的社会舆论乃至一些学术研究较多关注长距离社会流动,并且因为看到这种流动空间的收缩和流动机会的减少而断言中国社会结构正在或者已经固化,而轻忽各种短距离的社会流动的存在,忽视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差异,这并不非常合理。客观地说,社会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社会阶层分化的逐渐稳定可能是一种必然趋势,阶层再生产和社会结构相对固化也难以避免,即便在号称社会开放的发达国家,我们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带来的社会分化将会减弱,社会流动空间和机会也会收缩和减少。反过来,只要经济社会结构仍在发展变化和调整之中,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就仍然存在。当然,这种变化可能并不是单一方向的。例如,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带来大规模向上社会流动的状况不同的是,有研究者通过对上海的经验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可能不利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空间结构升级,这突出表现为传统职业被现代职业取代,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进入提高户籍门槛,采取精英主义吸纳原则,农民工、失业人员等群体由于无法与新兴产业进行有效对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往往被甩到社会分工的边缘位置,沦为城市的底层群体(文军、吴晓凯,2015)。

中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产业结构对就业人员的要求也有差别,不同类型的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会给社会流动带来不同的影响和机遇,使社会底层的向上社会流动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并不像东部沿海城市那样稳定地走向资本集约和高新技术化(郑长德等,2013)。相反,富裕的劳动力、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保存较好的生态环境是西部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 and 比较优势,其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结构调整与东部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发展就业容量较大、进入门槛相对较低的新兴产业(特别是非农产业)仍有较大空间。相应地,基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变迁而产生的各种短距离乃至中长距离的社会流动仍有可以期待的空间,至少可以延滞社会结构固化趋势的出现。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就业容量大、就业岗位层次多、进入门槛低等特点,能够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吸纳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岗职工、妇女、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就业方面尤其具有优势(郭为、何媛媛,2008)。如果西部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利用上述优势,发展就业拉动能力强的旅游业和相关产业,无疑将会为底层社会提供这样的机会。本文以湖南凤凰县为例,探讨经济结构变迁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和意义,以期从一个方面回应关于社会阶层结构固化或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社会舆论和学术论题。

湖南湘西凤凰县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边远地区于一体,是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6年6月起,我们先后两次前往凤凰县进行实地调研,历时总计2月有余,获得了大量数据资料和质性访谈素材。本文所使用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2005-2015年

《凤凰县统计年鉴》、2001-2013年《湘西统计年鉴》以及政府工作报告;质性访谈材料来自我们对被访者进行的结构式和非结构式访谈。

二、凤凰县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结构变迁

凤凰县地处武陵山区,是由苗族、土家族等28个民族组成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民族文化风情浓郁,山水秀美,但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1997年,凤凰县引以为傲的龙头国有企业雪茄烟厂被限产,致使全县经济急剧下滑,全县工业总产值减幅达28.66%,涉及1725名职工,多数被买断工龄,清退1000余名临时工,2001年,烟厂实行政策性关停。在这期间,与之相关的工业企业随之面临解体。1999年至2001年间,凤凰县酒厂、民族工艺厂、金属制品厂、机械厂、纸厂、印刷厂等多家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停产关闭,先后有3920名职工进行身份置换下岗,976名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其余下岗职工和大量的临时工没有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程度下降,成为县城底层群体。除此之外,当年凤凰县农村劳动力16.65万人,富余劳动力10.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4.8万人(凤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底层群体数量庞大,城乡就业形势严峻。

穷则思变。进入21世纪后,凤凰县在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制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原有34家国营、集体企业中有28家改为非公有制企业,将门店、仓库租给职工小组和个人经营,吸引赣、浙、粤及湖南省内邵阳等地客商到凤凰经营(凤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增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此外,借助民族多元文化优势,探索旅游发展,逐渐转让旅游景区(点)经营权,经济逐渐恢复,2015年被评为“中国最美人文休闲旅游名县”。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文化演艺、土特产加工、旅游服务等各行各业,形成了以旅游主导产业带动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一业带三化”特色县域经济发展局面,旅游产业的扩张和渗透逐渐改变了凤凰资源配置的格局和产业结构,并深刻地影响了职业流动。

旅游产业发展是推动凤凰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2000年,在凤凰县的地方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结构为32.4:27.1:40.5,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较高;至2005年,三次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为21.8:19.9:58.3;2015年进一步调整为12.1:16.5:71.4。图1显示,2005-2015年,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源于旅游产业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贡献。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等于旅游产业增加值的增量占GDP增量的比率。2005年,凤凰县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有17.14%,2008年达到了峰值83.05%,2009年开始,这一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5%左右,旅游产业是凤凰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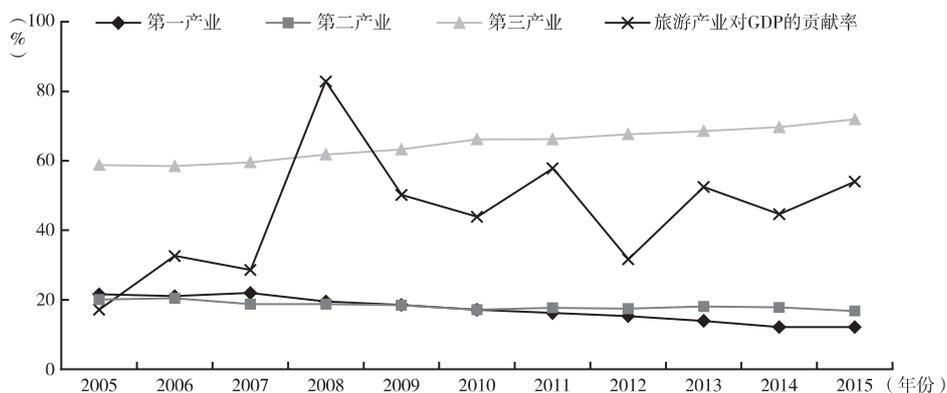


图1 凤凰县三次产业比例构成与旅游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注:根据相关年份《凤凰县统计年鉴》计算。^①

^① 凤凰县政府提供的相关材料,非正式出版物。

产业结构及其演变直接影响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就业结构和职业结构依存于产业结构,深受产业结构变迁和特征的影响。因此,21世纪以来,凤凰县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远超过第二产业。至2013年末,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由2001年的76.65:4.85:18.5调整为2013年的58.52:9.39:32.09(见图2)。劳动力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得全县就业人员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进一步调整,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大幅度增加,职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凤凰县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刻地改变了该县就业人员的职业分布结构,从而也为该县社会底层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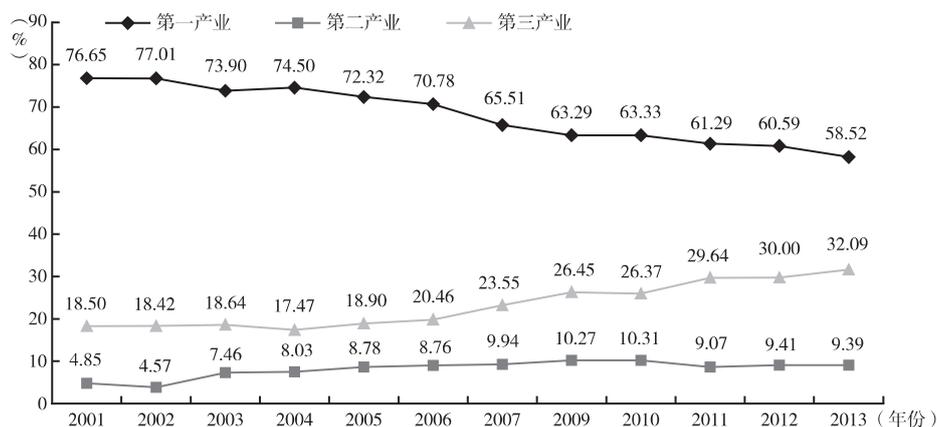


图2 2001-2013年凤凰县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变化情况

注:根据相关年份《湘西统计年鉴》计算。^①

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事旅游服务行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公有制单位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体,这意味着体制外的就业渠道和职业结构日益多样化,市场因素带来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路径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与2001年相比,2013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例的变化和职业种类和结构的提升,整体上改善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地位,职业与其他因素的叠加改变了人口规模在社会各个维度和等级地位上的分布。

三、旅游产业发展拓宽底层群体向上社会流动渠道

社会流动研究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和动力机制,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陆学艺,2004)。一般来说,个体的社会阶层地位变动主要通过职业流动变化实现。人们通常会比较初次工作的职业地位(初职地位)和现在工作的职业地位(现职地位)的变化。如果没有升降,说明没有发生社会流动;如果变化较小,说明发生了短距离的社会流动,亦即相关个人主要是在相邻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如果差距较大或很大(跨越了多个社会等级),那么说明发生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

(一) 旅游产业发展与城乡联通

就业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维持生计的主要方式。大量国内外的经验表明,社会底层的就业及其变动更多地受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影。旅游业是一个多层次的产业,其发展能够推动餐饮业、住宿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乡村旅游业扩大了农村居民增收渠道与就业

^① 湘西自治州统计局编《湘西统计年鉴》(2001-2009)、湘西自治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湘西调查队编《湘西统计年鉴》(2010-2013),非正式出版物。

机会,带动特色产业发展,改善乡村经济结构。凤凰旅游以凤凰古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沱江镇周边苗汉各乡镇遍地开花,具有一定自然条件和文化底蕴的苗汉村寨纷纷开展乡村旅游商业运营。截至2013年,全县开设乡村游的景点景区有20多个,2016年运营良好的有天龙峡景区、老家寨、苗人谷景区和山江苗族博物馆等。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主要以当地农民为主,有些当地村民通过开办餐馆、住宿和种菜等方式获得收益,有些凭借对苗歌、舞蹈、银饰和习俗等的了解和掌握在景点景区谋到一份工作,获得一定的收入。此外,凤凰县围绕旅游业发展了塘桥薰衣草生态旅游观光园、菖蒲塘现代生态水果观光示范园、竿子坪现代农业休闲观光示范园等一批农业旅游观光园,带动了12万亩蔬菜产业基地、2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等的发展,^①显著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从社会流动研究角度来看,这种变迁虽然没有造成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跳跃,从而实现职业的非农化变迁,但实现了收入维度的向上流动。

我们尤其注意到,一条由姜糖带动的就业产业链的发展,使凤凰县的社会中下层乃至底层的经济收入、就业、流动与其他群体产生了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姜糖是凤凰古城最具特色的土特产之一,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小吃越来越受到本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据统计,2015年,凤凰全县姜糖加工、销售企业(个体商户)340余家,产值达15亿,净利润10.5亿元,年消耗生姜1950余吨用于姜糖加工,带动了1.2万亩生姜基地建设,受益农户7600户,生姜平均亩产6900斤,常年市场价3-7元/斤,2015年生姜均价约4.5元/斤,总产值达3.24亿元。^②

(二) 旅游产业发展促进社会底层短距离社会流动

2003-2013年是凤凰县旅游发展起飞和壮大阶段,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分别增加了1.08万人和2.42万人,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增幅达到537.78%。^③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业从业人员也大幅度增长,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农民工和城镇的失业人口占较高比例,他们主要从事无需专门技能的体力或半体力工作。从事家政经营的企业家阿菊女士说:

从2000年我们县发展旅游业开始,特别是2005年游客明显多了之后,装修、餐馆和酒店都需要人,我们寨子周围的家庭妇女很少外出打工,女的跟着我干家政、保洁和餐饮,男的也有跟着我干装修。

商业服务员的的增长与工商个体户的的增长几乎同步。截至2016年3月,凤凰县共有个体工商户7338家,经营范围涵盖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④而据我们的实地观察,个体工商户的实际数量比登记数量多得多,走在凤凰的主街上,苗族银饰、服饰和美食的商铺琳琅满目。个体工商户主要来源于农业劳动者、下岗职工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在工作中边学边干,通过自主创业,流向个体工商户阶层。一位银饰店老板说:

我以前在厂里做美术工艺的,老公做机械的,下岗后,政府的人找到我们家,让我们试试搞银饰,带我们到丽江去学习,回来我们就开始做银饰的生意,慢慢的干起来。外地商户比较会做生意,我们向他们学,像客栈的网络订房,是外地商户先开始的,我们后来跟着学的,现在县

^① 凤凰县政府提供的材料,《以文化旅游产业带动扶贫攻坚》(凤凰县旅游和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6年5月7日)。

^② 凤凰县政府提供的材料,《凤凰县银器和姜糖加工销售情况》(2016年5月7日)。

^③ 2003年和2013年《凤凰县统计年鉴》数据。

^④ 凤凰县政府提供的材料,《发挥优势、凝聚力量,着力助推新时期工商联工作新局面》(在凤凰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里的客栈都搞网络订房。

(三) 就业信息渠道多元化与职业流动阻碍减少

就业信息资源是影响职业获得和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社会关系在求职过程中对获取就业信息和入职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产业发展之初,凤凰县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岗位少,农业劳动者和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难以通过正式渠道获取就业岗位信息,加上人力资本匮乏,传统社会关系成为获得职位的重要资本。一位宾馆领班回忆说:

2005年那个时候宾馆少,我是通过熟人介绍过来的,当时没有熟人也进不来,很难找到工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增多,求职渠道也呈现多样化,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求职阻碍减少,对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市场因素在人力资本与岗位之间匹配的作用提高,职业流动环境逐渐改善。一位与就业有关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目前找工作除了熟人介绍之外,县里有一个职业介绍中心免费介绍工作和培训,街上有广告栏,商铺雇人时,在上面写明招聘要求,现在商铺多,用工也需求大,比较好找工作。

以旅游产业为核心的机会结构,作为宏观因素拓宽了社会底层的社会流动渠道,有助于增加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接触面,增进各个阶层间的相互了解与相互联系。但要注意到,凤凰县旅游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岗位的扩增主要体现在中下层职业上,而非中上层和上层职业上。可以预见,随着凤凰县服务行业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扩张,还将会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和城镇失业群体流入这一阶层,通过自主创业,流向个体工商户阶层,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焕发社会活力,实现短距离社会流动,从而减少社会底层人员的比例,降低社会的总体不平等程度。

(四) 从社会底层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凤凰县旅游业发展中的长距离社会流动

2000年以来,旅游产业不仅对凤凰县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带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县域市场经济发展和所有制趋向多元化。1999年底,全县仅有私营企业123家(凤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 148),到2016年初,私营企业增长到565家,^①其中,450余家与旅游产业相关。^②在人数上,中小企业的私营企业主成为这一阶层的主体。私营企业主阶层成员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农业劳动者等,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长距离社会流动,甚至被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经济实力有明显上升。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重点访谈了三位私营企业主,他们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教育程度不高、职业经历或者生活经历与从事的行业相关、在创业前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下层或者中下层、目前从事的行业与旅游业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T女士是某服饰公司负责人,苗族人,娘家有曾经经营过苗族服饰的家庭作坊。受家庭环境

^① 凤凰县政府提供的材料,《发挥优势、凝聚力量,着力助推新时期工商联工作新局面》(在凤凰县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② 450余家是由政府提供的文献材料里餐饮企业、住宿(星级宾馆和规模的客栈)、演艺公司、物流公司、运输公司、旅游公司、文化公司、旅行社等等加总而得到的数字,除了矿场和重金属相关的公司与旅游没有相关之外,凤凰县的经济全面围绕旅游业。

的影响,懂苗绣技术,后来做了其他工作。凤凰发展旅游之后,发现市场上许多民族服饰不是苗绣,大多是外地产的,体现不出本地苗绣特色。看到这个商机后,2006年,她辞职创业。当时因资金不足,尝试和丈夫开一个小的苗族服饰商铺。以前的苗族服饰不太符合现在的审美观,她尝试改进,使它成为民族生活装。随着游客增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成立了公司。子女大学毕业后回家帮忙。现在公司里有20多位女员工,在农村还有100多位苗族和土家族女员工,拿活回家做。今年公司搬到新建的工业园区,准备扩大生产。T女士本人曾担任过凤凰县人大代表。(案例1)

阿菊女士是某家政公司负责人,苗族,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阿菊女士从15岁开始做生意,早上要走40里路,到乡里去赶边边场,1982年,在信用社学做饭,1983年到烟厂工作,工作积极,1998年下岗,然后到上海找工作,跟着别人做家政服务,在这之前她的第一任丈夫和最疼爱她的爷爷去世,对她的打击较大。后离开上海,回凤凰自己干,又做家政又洗车,成为个体工商户,2003年创办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她说家政服务生意是和旅游一同搞起来了,现在公司有200多名员工,这些人原来是烟厂下岗职工和老家周边农村妇女,多数是苗族和土家族。J女士本人曾担任过两届湘西州人大代表,一届湖南省人大代表。(案例2)

以上两个案例均是由个体工商户(以及专业户)转变而成的私营企业主,旅游经济发展对个人的生活产生转折性和持续性的影响,当然也突显出个体能动性对于生命发展轨迹的创造性型塑,个人能动性、务实与吃苦耐劳的秉性和对机遇的把握均对他们的事业等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后致性因素是她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机制。

龙先生是某宾馆的董事长,苗族,出生在农村,14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小学2年级文化水平,20岁后到部队当兵,在部队学炒菜的,复员后经介绍到政府招待所当厨师,工作3年后得到安置指标。2002年龙先生承包该宾馆,适应凤凰县开始发展旅游业的需要,龙先生先调整房子的布局结构,建房子找别人垫资,修好房子后找政府帮忙,把房子抵押出去向银行贷款,然后还别人钱。客人的入住环境条件得到改善。随着凤凰县旅游红火起来,宾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宾馆的员工全是苗族和土家族。(案例3)

三位私营企业主实现了从底层群体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流动,他们的成就较少依赖家庭资源,父母都是农民,经济资本积累较少,更多是凭借于其自身勤奋努力、聪明才干和凤凰县旅游发展的机遇。在凤凰县,450多个私营企业的创办,都与该县旅游业的发展直接相关,都是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占到全县现有私营企业的80%。可见,以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主要内涵的经济结构变迁,在凤凰县这样的西部地区,确实为相当一部分社会中下层乃至底层人员提供了中长距离社会流动的机会。

四、结论和讨论

纵观21世纪以来凤凰县中下层乃至底层社会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可以看到,在旅游产业发展的情境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使得社会流动的开放性影响因素增强,为底层群体生存和向上社会流动创造了机遇。旅游产业与个体能动性相互作用,使城乡、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空间继续扩大,底层社会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多,城乡之间和各个阶层之间的边界可渗透性增强。凤凰县的这种情况,在西部许多地区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表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变迁仍然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积极变化,尤其是这些地区的社会阶层结构仍具有较大的变动弹性,固化的趋势至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延滞。

具体来说,凤凰县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宽了社会底层的社会流动渠道,不同职业间的社

会流动规模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仍然相当可观。此外,随着社会底层规模的减少,凤凰县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也在扩大。可以说,凤凰县是我们观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的自然试验场,是观察新兴产业发展为社会底层提供向上社会流动机会的自然实验场。概括地说,在凤凰县这样的地方,就业容量大、进入门槛低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且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仍然为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就像前面提到的许多文献所看到的那样,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获得的不平等正在消减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导致宏观上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结构固化问题,而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关键,是减少这些文献所发现的种种社会不平等尤其是教育不平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本身寻找扩大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底层机会的削弱,只要能够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助推就业容量大、进入门槛低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相应发展。

应当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囿于收集资料的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研究还缺乏相应的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的量化分析,加上有些数据收集有着其他的目的,而非主要为进行底层群体的社会流动研究,所以本文未能详细描述 21 世纪以来凤凰县底层群体社会流动的全过程,对目前凤凰县整体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化、社会各阶层的比例及其变化等的考察还不够全面深入。因此,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考察和分析旅游产业等类似产业的发展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社会底层的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机制,为在宏观上出现社会结构开始固化趋势的情况下继续寻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结构性和机会,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边燕杰、卢强,2014,《阶层再生产与代际资源传递》,《人民论坛》第 1 期(中)。
- 凤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5 年,《凤凰县志(1978-2001)》,北京:方志出版社。
- 郭为、何媛媛,2008,《旅游产业的区域集聚、收敛与就业差异:基于分省面板的说明》,《旅游学刊》第 3 期。
- 李春玲,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民辉、陈旭峰,2014,《社会阶层流动受阻的表现与危害》,《人民论坛》第 1 期。
- 宋林霖,2016,《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阶层固化——政治学的解释与应对》,《行政论坛》第 4 期。
- 孙立平,2003,《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出版参考》第 17 期。
- 王洪伟,2010,《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社会》第 2 期。
- 文军、吴晓凯,2015,《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影响——以上海市的调查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杨菁慧,2012,《社会阶层固化:风险、成因与对策》,《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4 期。
- 余秀兰,2014,《教育还能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吗》,《高等教育研究》第 7 期。
- 郑长德等,2013,《转型期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动态优化与就业能力同步提升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 郑辉、李路路,2009,《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张芝梅

Keywords: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Vocational School Education Enterprise Training Self-lea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pportunity for Social Mobility *Sun Beibei*(6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a has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constraint of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social mobility. It is regarde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kind of solidification is the status of inequality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etc. In fact,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more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the bigger space of social mobility spac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social mo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where the economy is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but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Take the Fenghuang county in Hunan as atypical cas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in poor area o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opportunity for upward mobilit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could bring about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industry, provide the large amount of new employment positions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in poor areas, improv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distribution in employment and career structure, broade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channel of social mobility in society, and increase the opportunity for short-distance social mobility or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long-distance social mobility.

Keywords: Disadvantaged Group Tourism Industry Social Mobility

The Ontology of Ethnomethod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Sociology *Li Huadou*(73)

Abstract: In the sociology circle of both the West and Mainland China, there has always existed great controversy over the explanation on the ontology of ethnomethodology. In the dimension of action-structure, Garfinkel's concept of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extracted concept of "substructure" are the important improv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ified structure",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absorbed by contemporary theories. However, in the more radical dimension of individual-society, currently there exists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of this school. Regarding its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 understanding of rule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ts core concept "member", this school upholds a radical position of individualism, which is diametrically opposed to mainstream soci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 this position is the revision and evolution of Husserl's early idea of "solipsism". But this position of "anti-sociology" couldn't shake the status of mainstream sociology. Through the tension and balance with mainstream sociology, this position could prompt the mainstream sociology to keep alert of the risk in its own knowledge production. This is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its existence.

Keywords: Garfinkel Ethnomethodology Structure Individualism Mainstream Sociology

The Study on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Supawadee Sae-sue & Shan Yunming* (84)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stages' investigation of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Guangzhou area,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content,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of their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such factors including the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the level of Chinese proficiency, whether ethnic Chinese or not, an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etc.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o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There are more positive stereotypes than negative stereotype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sitive stereotyp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Studiousness" is the most profound positive stereotype, and "vulgarity" is the most profound negative stereotype. Whether ethnic Chinese or not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people, and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h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positive stereotypes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Fi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ause behind the stereotypes.

Keywords: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ereotypes Chinese People Ethnic Chinese